

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研究卷

云冈石窟研究院 编

文物出版社

《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李治国
编 委：李治国 张 焯 黄继忠
李立芬 李雪芹 刘建军
赵昆雨 张 华 张 艳

执行主编：赵昆雨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段书安

郭维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云冈石窟研究

院 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8

ISBN 7-5010-1901-0

I. 2005… II. 云… III. 云冈石窟-国际学术会议
-文集 IV. K879.2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971 号

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

云冈石窟研究院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89 × 1194 1/16 印张: 46. 5

ISBN 7-5010-1901-0/K · 1000

定价: 200 元

目 录

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五十年(代序)	李治国(1)
从《大慈如来告疏》说起——北魏孝文帝的云冈弥勒佛王造像	古正美(7)
论山西龙山石窟开凿于唐代贞元年间	李 淦(41)
平城地区北魏小石窟群的分期与云冈之关系	梁银景(57)
北朝幽宁地区部族石窟的分期与思考	暨远志 宋文玉(76)
仙人崖石窟新发现	董玉祥(110)
太和年间造像的变化与演进——以太和十三年铭造像为中心	李正晓(120)
试论响堂系石窟与地论系石窟的异同	王振国(130)
从西域到平城——北魏平城的外来文明艺术	张庆捷 赵曙光 曾昭东(143)
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及其意义	曹臣明(153)
古代佛、菩萨像的衣服及其名称	吉村怜(157)
“褒衣博带”与云冈石窟	张 焯(173)
敦煌石窟中的鲜卑族服饰文化研究之三——北朝鲜卑族服饰对隋唐及后世服饰的影响	谢 静 谢生保(177)
试论云冈第7、8窟雕刻中的鲜卑因素	李雪芹(185)
云冈石窟的佛像样式给与单尊佛像的影响	金 申(198)
云冈石窟某些题材内容和造型风格的源流探索	胡文和(210)
云冈飞天雕刻的类型及其特征	李立芬(231)
云冈石窟中维摩诘和文殊菩萨造像的探讨	张 华(239)
云冈石窟七佛造像题材浅析	王雁卿(251)
关于云冈石窟第5、6窟的人工系统	八木春生(263)

云冈石窟第6窟上层龕如来立像制作一考	小泽正人(273)
云冈石窟多臂护法神探源——从第8窟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谈起	陈清香(286)
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和武州山石窟寺的变化	石松日奈子(301)
中国石窟佛社造像最早出现于云冈石窟——云冈第11窟《北魏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造像记》探讨	李文生(309)
云冈第11窟营凿的几个问题	赵昆雨(313)
昙曜五窟新考——试论第18窟本尊为定光佛	小森阳子(324)
云冈20窟原始窟形初探	殷宪 刘俊喜(339)
云冈“昙曜五窟”帝王新说	陆屹峰(344)
《杂宝藏经》与龟兹石窟本缘壁画——兼论昙曜的译经	霍旭初(352)
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洞窟图像构成试论	李静杰(365)
粟特人与莫高窟第285窟的营建——粟特人及其艺术对敦煌艺术贡献	张元林(394)
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北周供养题记反映的历史与民族问题	魏文斌 吴荭(407)
麦积“姚秦五龕”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启示	夏朗云(421)
浙江新昌南朝佛教造像	费泳(432)
莫高窟第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	沙武田 梁红(441)
北响堂山石窟山东东平郡寿张县人曹礼造像题记考	张林堂(457)
龟兹地区石窟概况	王卫东(460)
库木吐喇石窟寺的龟兹风洞窟	李丽(470)
邳城地区新发现的慧光法师资料	赵立春(481)
麦积山第76窟考察	郑国穆(490)
云冈和麦积山早期洞窟的简单比较	董广强(502)
敦煌唐代壁画中宝相花纹饰及其运用	高明(509)
北魏太和期的中心柱窟	张宝玺(519)
云冈洞窟明窗窟门体系调查	王恒(525)
云冈、龙门北魏佛塔的比较研究	严辉 杨超杰(541)
北魏中小型造像石塔的形制与内容——以甘肃庄浪出土的卜氏石塔为中心	王元林(547)
从云冈石窟中塔的雕刻看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白志宇(574)
从云冈和麦积山看中国北方早期石窟寺的营建与分布	孙晓峰(577)
大同北魏石窟的皇帝造像——读《云冈孝文石窟考》而发	张畅耕(583)
云冈石窟与善阁崛山	辛长青(585)
佛教的大众化与敦煌石窟——以经变画为中心	杨秀清(591)

北魏佛教由“涅槃学”到“净土学”的开展——云冈“昙曜五窟”的造像	赖鹏举(607)
北朝象教及其佛教造像意识	李书吉(616)
简论西域文明与龙门石窟	张乃翥 张成渝(624)
云冈石窟——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带来了音乐繁荣的历史见证	肖兴华(642)
云冈石窟舞蹈雕像多元风格溯源	王克芬(654)
云冈石窟乐器图像补正与辨识	林 莎(659)
云冈石窟背光	卢秀文(675)
云冈石窟中纹饰之探讨——以莲花纹、火焰纹、龕柱装饰纹为例	吴仁华(686)
晖福寺碑赏析(并注)	赵一德(703)
云冈石窟双窟造像的审美文化研究——模式、分解与对称、互补	王建舜(722)
昙曜五窟大佛的形与气	毛志喜(730)
佛母塔洞与冯太后——云冈石窟文化内涵解读	管芙蓉(733)
后记	(737)

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五十年 (代序)

李治国

云冈石窟研究院

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魏的故都,也是5至6世纪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云冈石窟作为北魏建都平城时留下的大型石窟寺庙文化遗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的典范,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繁荣期杰出的例证。进入20世纪后,经过各国专家学者的共同耕耘,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当今国际社会,在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认知和佛教考古艺术的研究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5年7月26~30日召开的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我国文物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石窟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近300位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为期五天的会议,共安排了41场学术交流报告会,103位专家学者宣讲了论文,提交学术论文160余篇。

其中,石窟保护方面,围绕保护理念、保护环境、病害调查、检测分析、病害机理、保护材料、保护实例以及遗产保存、利用及合作等等多个学科与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涉及的介质包括石窟、摩崖、岩画、石构建筑、壁画、彩塑等,取得了丰硕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与会代表中有许多科研单位、专业院校及企业中深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由于他们对文物保护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在科学化、规范化方面得到了长足进步,体现了多学科合作攻关的必要性。

石窟研究方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论文内容:(1)石窟建造;(2)题材考证;(3)石窟雕刻所反映的宗教信仰;(4)石窟与当时社会历史的联系;(5)中国石窟的比较研究;(6)石窟雕刻艺术史研究。有的从图像学的角度进行题材考证;有的探讨当时的信仰在造像上的反映;有的则从政治背景下考察相关内容;也有对其他石窟寺研究的论述,如甘肃敦煌、麦积山、武山水帘洞,新疆库木吐喇、龟兹石窟,河南龙门石窟,浙江新昌南朝佛教造像,重庆大足法华寺摩崖造像,陕西邠宁地区部族石窟,山西龙山石窟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仙人崖石窟等,范围广博,内容丰富,展示了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上取得的新成果。

今天,我们已将会议中部分论文编为《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和《2005 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值此,概况性地总结并回顾 50 年来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考古研究的历程,对于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 20 世纪初至今,云冈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 20 世纪初萌芽期 (1902 ~ 1949 年)

从学术意义上讲,最早调查云冈石窟的是 1902 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同年,他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提出云冈造像受西方犍陀罗艺术影响的观点。1907 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云冈进行调查,率先公布了一批云冈石窟的图像资料。

在日本,还出现了关于云冈造像渊源问题的讨论。大村西崖在《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认为,云冈早期雄伟的造像形象是表现北魏拓跋鲜卑民族最理想的形象;松本文三郎和关野贞认为,中印度笈多造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云冈造像艺术;塚本善隆认为,昙曜五窟是为太祖道武帝以下五帝所造;小野玄妙勾画出从犍陀罗沿丝绸之路发展到龙门的谱系,突破了以前云冈研究的局限性。

瑞典喜龙仁是西方研究云冈影响最大的学者,他在《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中对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特点进行了论述,认为云冈造像明显具有两种风格:一是印度式风格,主要表现在大像雕刻上;一是汉地本土风格,主要表现在小型造像上。

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首推陈垣先生。1919 年,他从史料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史料进行考证,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后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文中指出,昙曜既是云冈石窟的创凿者,也是云冈译经的创始者。稍后,从事佛教史研究的汤用彤先生提出云冈佛教造像源出凉州的观点。30 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在云冈进行调查,从建筑学角度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书中系统地分析了云冈石窟中的北魏建筑样式,指出了云冈北魏建筑的西方因素和汉地传统因素。此外,大同学者白志谦编写的《云冈石窟寺记》,对云冈当时保存状况做了客观的调查,并注意到对云冈窟檐遗迹的记录,这是当时中国学者比较详尽的一份调查报告。

云冈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是,1938 ~ 1944 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在云冈石窟进行的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同时,他们还在第 7 ~ 13 窟、14 ~ 20 窟等窟前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

二 新中国 30 载开拓期 (1949 ~ 1980 年)

石窟保护方面。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管理工作十分重视。1950 年,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裴文中先生率领雁北文物勘查团到山西北部进行调查,发表了《雁北文物勘查报告》。1955 年设置了专职机构大同市古迹保养所,后相继更名为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和管理的工作。从 1949 ~ 1980 年的三十年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冈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60年，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云冈石窟保护专家会议”，拉开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云冈石窟的序幕。

随后，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会同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化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合作，就云冈石窟的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并对云冈石窟的地形、气象以及国内外有关石窟保护、防止岩石风化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经过初步踏勘与研究，全面掌握了云冈地区的地质状况，找出岩石风化崩裂坍塌的原因，提出若干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选择崩塌和风化情况比较严重的第1窟和第2窟作为试点，撰写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修缮工程第一、二窟试验性修缮方案说明书》，在岩石加固的化学方法处理上，针对云冈石窟复杂的残破情况，提出《云冈石窟岩石加固的化学方法处理问题》，应采取土木建筑工程和化学方法处理并举的措施，以求取得比较全面、彻底的防护效果。从1962~1964年，先后对云冈第1窟塔柱，第10与第11窟前立壁间一龕内佛头、臂膀，第14窟塔柱以及西部窟群危岩裂隙进行了化学材料灌浆、粘接加固试验，在石窟稳定性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经过多年的试验，应用环氧树脂进行裂隙灌浆并结合锚杆加固洞窟的方法已经成熟。1974~1976年，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对云冈中央区主要洞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维修，基本上解决了该区域石窟的坍塌问题。1978年3月，我所与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合作在石窟围岩高分子化学材料灌浆加固研究及其实际应用上取得成功，这一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目前为止，该项技术仍在国内石窟保护领域广泛应用。

这一时期，国内各研究机构有关云冈石窟保护研究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北京地质学院王大纯、沈孝宇撰写了《云冈石窟工程地质问题》，通过对云冈石窟的工程地质和测绘等综合性的调查研究，认为崩塌是云冈石窟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风化是又一严重问题；水与岩石长期而缓慢的相互作用是雕刻品遭受风化破坏的主要原因。林茂炳、赵不忆撰写的《大同云冈石窟岩石风化调查报告》将云冈石窟风化类型进行详细划分。此外，北京地质学院山西云冈石窟物探科研队应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对云冈石窟岩体裂隙发育和砂岩风化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云冈石窟的应用》一文，这是应用地球物理方法在文物保护研究中的首次应用。

考古研究方面。1951~1956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出版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内容广博，卷帙浩大，代表了当时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成果影响至今。

宿白教授，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善本书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抄本。50年代初以来，他又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先后完成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等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云冈石窟的寺院设置及沿革、洞窟的整体布局和分期的深入研究，进而对云冈石窟的编年提出新的学说。1977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李治国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丁明夷首先采用宿白先生创导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完成了《云冈石窟》一书。1978年，宿白先生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及其历史背景做了全面的阐述，并由此引发了与

日本长广敏雄教授的一场讨论,这也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实际上,长广先生与宿白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对推动云冈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刘慧达先生对北魏石窟中的三佛题材和三佛窟的演变做了分析探讨,同时研究了北魏石窟与禅修的关系和北魏石窟的性质问题。这一时期的云冈考古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阎文儒、杨泓、董玉祥先生等对云冈石窟造像题材的考证与分析,吉村怜、常任侠先生等对云冈石窟佛教艺术的探讨,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 80 年代以来,构建科学保护与学术研究发展期

1980 年以来,改革开放给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先后完成了“云冈石窟‘八五’维修保护工程”、“109 国道云冈段改线”、“云冈石窟景区周边环境整治”等保护工程。目前,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正在实施,由我所保护室承担的国家文物局、省科委等部门资助的五项科研课题也在完成中。考古研究方面已经启动“云冈石窟洞窟调查”项目。

1. 云冈石窟“八五”维修保护工程

随着石窟岩石稳定性问题的基本解决,石雕风化问题弥显突出。经过上一阶段近 30 年的研究,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各级政府拨专款,从 1990 年开始进行“云冈石窟‘八五’维修保护工程”。在当时召开的“云冈石窟石雕风化治理规划”专家论证会上,认为,造成石雕风化的主要原因是水和大气污染,为此采取了防渗排水、改善环境、修建保护性窟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综合治理措施,先后完成了:①降低窟前地面,修筑排水渠道;②修建第 7、8 窟木结构保护性窟檐;③在石窟崖顶绝对保护区修建保护性围墙;④局部石窟顶部防渗排水试验研究工程;⑤洞窟保护维修加固工程。这些工程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治理环境污染的 109 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

环境污染是造成云冈石雕风化的主要原因。而当时仅距云冈石窟 350 米的 109 国道云冈段是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大吨位运煤车辆通过,由此引发的粉尘污染致使该地区的空气污染物含量,特别是总悬浮物含量严重超标,对云冈石雕造成严重威胁。经多方呼吁和长时期的努力,得到了原国家计委陈锦华主任、交通部黄镇东部长、山西省政府以及大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投资近 2.3 亿元人民币,将 109 国道云冈段改线 26 公里,从而彻底解决了 109 国道云冈段的污染问题。同时,大同市人民政府投资 1800 万元人民币,将原 109 国道云冈段辟为云冈旅游专线,并对专线两侧及视线所及范围进行多次大规模绿化,从根本上改善了云冈石窟的周边环境。

3. 走向世界,国内及中外合作的保护研究

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手段来研究文物保护问题,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取得共识。在石窟风化研究方面,黄克忠先生首次从地质学角度论述了云冈石窟石雕风化的情况及风化类型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治理风化石雕的设想。黄克忠、钟世航先生在国内首次应用微测深仪对云冈石雕风化部分的深度进行了测试,推断一般风化深度在 0.2~2 厘米之间,最深达 7 厘米。在环境影响研究方面,解廷藩、苑静

虎、黄继忠先生提出环境污染对石窟风化起到了催化和促进作用以及气候环境的变化对石窟影响的机理。黄继忠先生指出粉尘对石雕影响，既有物理作用，又有化学作用，二者长期共存，交替作用，互相促进，使云冈石雕严重风化。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完成防渗排水、气象、环境的监测、颜料分析和培养等项目。1998年9月7日至10日召开了“中德专家合作保护云冈石窟98科技研讨会”，就云冈的石雕风化原因及科技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影响云冈石窟石雕风化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是水和环境污染等因素。

4. 石窟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

云冈窟前遗址发掘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规模十分有限。70年代以来，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今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①）会同中国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等单位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均取得了较大收获。如1972年，在第9、10窟窟前发现了前后二期建筑。第一期建筑遗迹是一处面宽七间北魏以后辽代以前的窟前建筑。有学者怀疑这就是《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的遗迹。第二期是一处面宽五间、进深二间辽金时期的建筑。同时，在第9、10窟立柱上方风化严重的崖面上发现屋顶出檐和人字形叉手的遗迹，表明北魏时期第9、10窟整个外观是一座十分壮丽的仿木构建筑窟檐。此外，在第12窟外崖上面发现庑殿顶屋檐，从而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窟檐问题。

1992~1993年，对部分窟前建筑遗址做了清理发掘工作，发现四处建筑遗址，最重要的是在第3窟遗址的发掘，发现窟前面宽九间、规模宏大的辽金建筑遗迹，同时在窟内外发现了北魏时期基岩地面未凿完的遗迹现象，揭示出北魏开凿石窟程序、方法等前所未有的情况，对于研究诸如云冈这样大的石窟工程的开凿次序和操作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提出“云冈模式”这一概念，强调了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他认为：“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把云冈石窟研究价值提到如此高度，正是宿白先生全面考察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精髓所在。

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专业研究人员在国际、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另外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全两册）、《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云冈》、《云冈百年论文选集》、《云冈保护五十年》等十余种大型图书。

近年来，国际云冈研究出现了一批新生代学者，如八木春生、石松日奈子、小森阳子等。与此同时，大同学者也不断有专著呈示学界。

21世纪，云冈在科学保护、考古研究、遗址管理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要实现已列入国家“十五”计划中“云冈石窟石雕文物防风化治理，即防水工程”重大课题的突破，需要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思路，勇于探索，努力实践，还要与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机

^① 2006年7月更名为云冈石窟研究院。

构进行合作，联合攻关。

其次，佛教石窟考古报告的调查与编写，是石窟保护与石窟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建立完整的云冈佛教考古资料系统，有计划地刊布云冈石窟调查报告。

再次，云冈石窟于2001年12月14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作为政府委托的机构组织，将严格按《云冈石窟规划》履行工作，积极探索石窟寺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考古发掘、学术研究、永续利用新途径，深入研究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走出一条既稳步前进又健康发展的路子。

是为序。

从《大慈如来告疏》说起 ——北魏孝文帝的云冈弥勒佛王造像

古正美

香港大学佛学中心

一 序言

1998年王惠民在《敦煌研究》发表了一篇《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的论文。在论文中：《大慈如来告疏》是1947年7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中寺（土地庙）佛像肚中发现的117件文书中的一件。今藏敦煌研究所，发表号007。该写本长34.3、高20.8厘米，共19行，首尾完整，但第2~16行下部有缺损，致使文书难以粹读^①。由于《大慈如来告疏》（此后简称《告疏》）有“兴安三年（454）五月十日谭胜写”^②的书写人署名及日期，王惠民因此认为，《告疏》的出现不仅说明此《告疏》是对兴安三年稍前北魏太武帝（423~452）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全国毁佛活动的反动，同时也说明当时佛教“末法信仰”的状况，或与之有关的民间弥勒信仰的状况^③。

在谈论《告疏》出现的可能情况之前，我们必须再次解读《告疏》的内容，因为《告疏》中还记有王惠民在其文中没有讨论的事，特别是北魏时期弥勒佛王（Buddharāja Maitreya）信仰的状况及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弥勒佛王信仰的情形。王惠民在其论文中用自己的解读方法将《告疏》作了标点，笔者在此文中基本上沿用其标点的文本。

《告疏》的第一行：“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④，即很清楚地说明，流通《告疏》的人物，就是以“大慈如来”身份或弥勒佛（Buddha Maitreya）身份出现于《告疏》流通日期，即“十月二十四日”的人物。《十地经义》卷一提到：“本修行法门如弥勒菩萨，昔为国王时至僧伽蓝中见诸比丘坐禅皆有光明，唯一比丘光明独胜，即问比丘修何三昧光明殊胜逾于比丘。比丘答言，我修慈三昧藏，

①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42页。

②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43页。

③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43~45页。

④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42页《告疏》第一行。

是众善之本，所以殊胜。因即发愿，愿我未来世中常修慈三昧，今日得佛，即曰慈氏。”^①又《白宝□抄》卷八十八（弥勒法下）也提到：“时弥勒菩萨住发生普遍大慈三昧，……又弥勒正音味底哩曳，此云慈氏。此名字即是真言，以最初昧字摩为种子。摩是心意，亦是大慈。”^②这就是弥勒有“慈氏”或“大慈”之名的来源。虽然《告疏》没载有《告疏》出现的确切年代，然因其载有《告疏》抄写的人名“谭胜”及日期“兴安三年五月十日”，王惠民因此认为，《告疏》出现的时间应该在兴安三年（454）之前的某年十月二十四日^③，因为《告疏》也载有《告疏》流通的这个日期。谭胜在北魏兴安三年尚书写、流通此《告疏》，说明兴安三年左右此《告疏》曾在北魏流通。以此《告疏》出现的地点敦煌来判断，此《告疏》很可能就是当时中国北方或西北流行的一种弥勒信仰。

兴安三年是北魏文成帝（452~465）继其祖父太武帝之位后的第三年，其年也被称为兴光元年。《告疏》的内容主要说明弥勒佛下生的信仰，因《告疏》中所言的“大慈如来”除了指下生的弥勒佛外，《告疏》第十行也提到：“〔弥〕勒佛一心敬礼称十方诸法，一心牟尼佛□□……”^④；更在第十三行提到弥勒佛以“宝王”的身份下生^⑤。

王惠民在其文中提到早期中国有三类弥勒信仰：（1）禅僧决疑、（2）兜率往生（上生）、（3）阎浮救度（下生），并认为《告疏》所载的弥勒信仰乃是中国早期具有上、下生概念的弥勒信仰^⑥。王惠民在文中没有提到为何《告疏》第十三行会称下生的弥勒佛为“弥勒宝王”：“弥勒宝王，污我形体，毁经法。时阎浮地……”^⑦很显然，《告疏》中的弥勒佛也是以“宝王”的身份出现。这种弥勒佛也以“宝王”或“帝王”身份出现的信仰，不见记于王惠民所提到的三类弥勒信仰。既是如此，《告疏》所载的“弥勒宝王”信仰，并不能用王惠民所言的“上、下生经”所载的弥勒信仰来解释。

弥勒以“宝王”的面貌出现于《告疏》，说明《告疏》在北魏流通的时代，已经有北魏人士或帝王欲以“弥勒宝王”的身份统治北魏。《告疏》这种“弥勒宝王”的信仰，很显然的与隋、唐之际流行的弥勒佛下生为王的信仰属于同一性质的信仰^⑧。由此，我们有必要再检查《告疏》流行时代的弥勒佛下生为王的信仰性质和意义，并与云冈造像的关系。

二 北魏佛王信仰的背景及概况

1. 北魏早期的佛王信仰内容及背景

《告疏》中所载的“弥勒宝王”一词，有“弥勒佛即是王”或“王即是弥勒佛”（he who is Mait-

① 《十地义记》，《大正》卷二十六 238 下~239 上页。

② 《白宝□抄》卷八十八，《弥勒法》下，《大正·图像部》卷六 471 页下。

③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 43 页。

④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⑤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见下详述。

⑥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 45~46 页。

⑦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 42 页第十三行。

⑧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五章《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年）；古正美：《武则天与堕和罗的弥勒佛王信仰》，未刊，将收录于“2004 年龙门石窟国际会议论文集”。

reya is rāja) 的意思。笔者在过去一直使用“弥勒佛王”(Buddharāja Maitreya)一词来说明如《告疏》中所载的“弥勒宝王”的意思^①。《告疏》中所载的“弥勒宝王”一词,事实上乃是笔者首见的中国文献称呼“弥勒佛王”的称号。北魏文成帝登位初期会出现“弥勒宝王”的信仰,自然与当时中国北方已有帝王以“佛”的面貌治世,或帝王被称为“如来”(佛)的佛教信仰背景不无关联。《魏书·释老志》即载有文成之前的北魏僧人法果“每言太祖明教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②北魏僧人法果视北魏太祖(386~409)为“如来”或“佛”,便有视当时的太祖为“佛王”或“宝王”(Buddharāja)的意思。

在北魏太祖知道有“佛王”信仰之前,中国四世纪前半期统治后赵(319~352)的石虎(334~349)即有“去皇帝号”以“大赵天王”或“佛王”的姿态统治中国的活动。石虎所做的“天王”也以佛的面貌统治世间,因此也是以佛教“佛王”的信仰作为其统治中国的方法。石虎之后,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到许多南北朝时期及之后的帝王也追随石虎的后尘,以“天王”或“佛王”的姿态统治中国。譬如,前秦的苻坚(357~385)、后秦的姚兴(393~416)等也都以“天王”或“佛王”的姿态统治中国^③。由此,北魏太祖并非中国第一位接触“佛王”信仰的帝王。

2. 北魏沙门叛乱团体的佛王信仰状况

法果在称呼太祖为“如来”时,是否有视太祖为“弥勒佛王”或《告疏》所言的“弥勒宝王”?我们从目前保存的资料并不能完全看出太祖时代发展佛教的真实状况,但就目前学者对北魏佛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民间佛教叛乱团体或沙门叛乱团体的研究,我们至少能对北魏弥勒佛王信仰或其他佛王信仰的发展状况有一些了解。

有关北魏太祖时代的佛教活动状况,史料及文献都记载得很少,因此目前对太祖时代的佛教发展状况,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倒是因为史料记载有太祖时代及其之后的佛教沙门叛乱事件,学者因此常从此角度去了解北魏早期佛教的活动情形。由于北魏沙门的叛乱活动,都与“皇帝即如来”或“佛王”的信仰有关,故从这些沙门的叛乱事件也能看出北魏“佛王”信仰,甚至“弥勒佛王”信仰的发展状况。

从太祖道武帝开始,北魏的历史便常载有各种民间的叛乱事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出家的佛教沙门也常见有叛乱称王的情形。这些沙门的叛乱,可以说也能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的内容及状况。道武帝时代沙门张翹以“无上王”的名誉叛乱^④。由此,北魏沙门叛乱的原因,也与历代民间“叛乱”的原因一样,都要“改朝换代,自立为王”。塚本善隆在解释太祖时代沙门叛乱的情形时,并没有提

①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五章《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古正美:《武则天与堕和罗的弥勒佛王信仰》,未刊,将收录于“2004年龙门石窟国际会议论文集”。

② 《魏书·释老志》。

③ 有关石虎及其后中国帝王施行“天王”信仰统治中国的报告,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二章《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石虎时代的天王传统》66~103页,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

④ 《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五年(403)二月沙门张翹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

到太祖时代的沙门叛乱为“弥勒教匪”的叛乱，反而提到张翹在当时“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行唐”的叛乱，并不是北魏首见的民间因疾苦的原因而出现的沙门反政府活动。他说：在张翹叛乱出现的十余年前，河北便有同样性质的沙门法长利用佛教自立为“天子”的叛乱^①。塚本善隆更提到，受到太祖重用的沙门法果也是从叛乱沙门张翹故乡河北鄯城（今河北临漳）附近来的僧人^②。这说明，由于鄯城有“佛王”或“皇帝即如来”的信仰背景及历史，张翹的“无上王”信仰便很可能与当时的“皇帝即如来”的信仰有关。

最早在河北鄯城以“皇帝即如来”的面貌建都的皇帝，就是后赵的石虎。后赵的石虎在迁都于鄯之后虽然以“天王”的王号（336）称呼自己，然从其时代的文献记载来看，石虎的“天王”面貌实际上就是“佛王”的面貌。石虎的“佛王”信仰似乎与后来齐文宣（550~559）及隋文帝（581~604）所发展的“月光童子”信仰也有密切的关联^③。因此，无论张翹的“无上王”信仰与石虎的“天王”信仰有无关联，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佛王”信仰，从石虎时代算起至太祖时代，已经有近五六十年的发展历史，熟知此时代佛教发展性质的佛教沙门，自然都具有“佛王”治世的知识。

北魏太祖之后的沙门叛乱事件，以齐建元三年（481），即孝文帝太和五年，沙门法秀的叛乱事件最为有名：“沙门法秀以妖术惑众，谋作乱于平城，苟颓率禁兵收掩，悉擒之”^④。学者常将北魏沙门的叛乱通视为“大乘教匪”的叛乱。因为在北魏的沙门叛乱事件中有叛乱沙门号称自己为“大乘”。在史料上首见的“大乘教匪”的叛乱，实际上始于北魏肃宗孝明帝（515~528）登位的初始：“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肃宗时代“大乘教匪”的叛乱，有平定后再乱的例子。譬如，其余党于熙平二年（517）便有再犯的活动^⑤。《资治通鉴》对法庆“大乘教匪”的叛乱作了如下的报道：

（天监十四年，515）六月，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渤海人李归伯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麟击之，伯麟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⑥。

由于此段文字提到“大乘教匪”叛乱的原因是有“新佛出世”，由此，我们更能看出，北魏沙门叛乱的原因是，叛乱者或沙门要以“新佛出世”或以“佛王”的面貌统治中国。许多学者因此时代有弥勒信仰盛行，故常将北魏时代“大乘教匪”的叛乱称为“弥勒教匪”的叛乱^⑦。事实上从记载北魏历代沙门叛乱的史料来看，我们乃无法看出法庆之“新佛出世”的信仰具有“弥勒佛王”的信仰

① 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第二卷145~150页，日本大东出版社，1974年。

② 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第二卷147~151页，日本大东出版社，1974年。

③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二章《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石虎时代的天王传统》65~103页，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

④ 《资治通鉴·齐纪》卷1，903页中、下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⑤ 《魏书·肃宗纪》。

⑥ 《资治通鉴·梁纪》。

⑦ 张继昊：《北魏的弥勒信仰与大乘之乱》，《食货杂志》155~175页。

内容。

纵然从目前保留的史料很难看出北魏初期“佛王”信仰的确实内容及状况,然由于《告疏》的出现,我们知道在文成帝统治北魏的初期,即5世纪中期左右,北魏即已有“弥勒宝王”的信仰。

3. 《告疏》的弥勒佛王信仰性质

《告疏》的出现既在北魏文成复佛的初期,此《告疏》到底是民间流行的“弥勒佛王”信仰内容,还是北魏官方所提倡的“弥勒佛王”信仰内容?王惠民视《告疏》所载的弥勒信仰为民间的弥勒信仰。王惠民说,《告疏》的出现乃是民间对之前北魏太武帝毁佛的“反动”或公开“对抗性”声音^①,也是当时末法信仰的一种现象^②。但就此《告疏》以《疏》的形式出现及流通天下的情形,其很可能就是当时官方流通的“弥勒佛王”下生信仰的宣传品。原因是,初唐时代的武则天在以“弥勒佛王”的面貌统治大周(690~705)之际,其所流通的有关其弥勒佛王信仰的宣传品《大云经疏》,也以《疏》的形式写成并流通天下;且《大云经疏》所使用的语言也和《告疏》一样,都用非常口语式的宣传语言表达武氏以“弥勒佛王”下生或“出世”的信仰^③。我们虽能作此猜测,然就《告疏》本身的文字,我们还是无法判定《告疏》是北魏官方或民间流通的弥勒佛王下生宣传物。

北魏弥勒宝王下生为王的信仰,除了可以用《告疏》及史料来说明其发展的历史及现象外,我们也能从此时代的民间佛教造像情形来了解北魏弥勒佛王信仰的状况。

三 北魏弥勒佛王的造像情况

1. 单尊弥勒佛立像

就金申收录目前具有纪年的北魏弥勒佛造像的情形来判断,北魏时代制作的弥勒佛像,有单尊立像、单尊坐像,太和之后更出现有大量的弥勒佛三尊像。北魏大量制作单尊弥勒佛立像的时间,上可推至孝文帝拓跋宏(471~499)统治北魏的初期,而下限则可推至北魏亡国的时间,即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这说明北魏的弥勒佛下生信仰自孝文帝开始推动、发展之后,北魏一代一直有发展弥勒佛下生信仰的活动。金申收集的具纪年的北魏单尊弥勒佛立像就有下列这些:(1)日本个人收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北平无终县韩令姜为父母造弥勒一区”、(2)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发干县李日光、□李山之父母造弥勒像一躯”^④、(3)现藏日本太和十六年(492)“瀛州王虎兄弟三人为祖父母、父母造弥勒像一躯”^⑤、(4)日本泉屋博物馆收藏太和二十二年(498)“肥如县比丘僧普贵为父母造弥勒尊像一躯”^⑥、(5)现藏日本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泉州阳颐原为亡父等造弥勒像一区”^⑦等。

①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43~45页。

② 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45页。

③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第五章《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240~249页,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

④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47页,58~59页图38,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⑤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53页,82页图54,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⑥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57页,97页图65,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⑦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65页,133页图90,文物出版社,1994年。



图一 太平真君四年苑申造弥勒下生像



图二 太和时期(477~499)铜佛立像

这些具纪年的弥勒佛造像，基本上都是孝文帝统治北魏之后的造像。除了具有弥勒名字的立像外，有些“释迦立像”因与此时代的弥勒佛立像的造像型式相同，故笔者也将之归类为弥勒佛立像类。譬如，张（言立）载于延兴五年所造的“释迦立像”^①，虽与同年“韩令姜为父母造弥勒立像”有穿“通肩”与“右袒”佛衣之别，然这类造像都被笔者视为弥勒佛立像。因为太和八年“李日光等造弥勒立像”及太和二十二年（498）“普贵造弥勒立像”都是穿“右袒”式佛衣的弥勒佛立像。此类弥勒佛立像，右手虽然常作说法印，左手或握佛衣，或下垂，然其两手也常在上身两侧呈右上左下两掌相向作打开状。譬如，太和十六年“王虎造弥勒立像”就属于此类。如王虎所造的弥勒佛立像者，早见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太平真君四年（443）苑申所造的“金铜佛像”^②（图一）及现藏意大利太平真君五年（444）造“鎏金铜佛立像”^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太和时期（477~499）造的“铜佛立像”（图二）^④，也属于同类型的造像。这说明孝文帝时代的弥勒下生信仰的性质及内容早在太武帝真君时期已经传入北魏。

目前保存的具纪年的北魏单尊弥勒佛立像，都有一致的造像形式或内容（造像法），即使出现变化，其变化的情形也非常一致或有规律。金申收录的两尊太平真君时代的金铜佛像，都没有明记此二尊像是弥勒佛立像，其中一尊像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高阳人苑（范）申于太平真君四年（443）为“东宫太子”所造的“□玉菩萨”像。该像载有“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的造像记内容。另一尊像则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太平真君五年（444）造的“鎏金铜佛立像”。这两尊像的造像法除了与后来北魏的单尊弥勒佛立像的造像法一致外，也有“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的造像记内容可证明此二像的造像背景与弥勒佛下生信仰有关。

太平真君四五年间出现在北魏的弥勒佛下生信仰，与同时代在南方出现的弥勒下生信仰，其性质及内容非常相同。因为后者的弥勒下生信仰也非常重视“龙华三会，听受法言”的意义。我们在南方见到最早的有关弥勒下生信仰的活动乃载于《水经注·泗水》：“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

①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43页，图27，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②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36页，12、13页图10，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③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37页，14页图11，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④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449页，65页图43，文物出版社，1994年。